

产业政策如何影响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

刘婷婷¹ 高凯^{2,3}

(1.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国际经贸学院, 上海 200120; 2.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201600;
3. 上海大学 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 从政府干预视角入手, 研究产业政策影响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的效果及具体机制。结果显示, 产业政策对企业竞争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且该影响体现出异质性。具体而言, 从省份差异视角看, 上海市地方产业政策效果最优, 其次是安徽省, 再次是江苏省和浙江省; 从产权性质视角看, 产业政策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竞争力提升, 但对非国有企业效果不明显; 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看, 受产业政策支持的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竞争力明显提高, 而衰退期企业效果不明显。进一步探讨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机制、创新激励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 结果发现, 产业政策支持下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创新激励对企业竞争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银行信贷以及市场竞争效果不明显。识别出产业政策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因果关系, 厘清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机制, 对未来长三角地区产业政策制定以及区域竞争力提升均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政府干预; 产业政策; 企业竞争力; 长三角地区; 异质性; 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 F260; F06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301(2020)01-0071-13

一、引言

2018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上提出, 支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该战略定位将进一步增强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创新力和影响力, 对于提升区域竞争优势意义重大。区域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 刘志彪^[1]曾指出统一协调和规划各地产业政策将有助于推动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水平, 提高地区竞争能力。在现代中国产业的发展历程中, 产业政策一直是政府引导产业发展方向, 提升产业技术水平和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工具。产业政策是否影响了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 产业政策通过何种机制对企业竞争力施加作用? 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 将有助于政府不断完善并协调相关产业政策, 推动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提升区域竞争力。

事实上, 鉴于产业政策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 产业政策与微观企业主体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与实际部门关注的焦点。大部分文献对产业政策与企业融资、投资、创新等企业行为的关系展开了丰富探讨^[2-4]; 部分文献对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绩效等经营成果的关系进行了研究^[5-6]。其中, 部分学者认为产业政策能够弥补市场缺陷、缓解企业融资压力、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

收稿日期: 2019-10-25; 修回日期: 2020-01-03

作者简介: 刘婷婷(1989—), 女, 山东德州人, 经济学博士,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国际经贸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公司治理; 高凯(1990—), 男, 山东德州人, 通讯作者,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上海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与公司人力资本。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BJY178); 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教育部青年课题(EGA160396)

平和企业生产率^[3,7]。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便是一个最直观的特征事实,因为其背后政府“看得见的手”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但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政府在信息不对称及有限理性的限制下,容易扭曲市场对资源的配置,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产业政策支持下企业的过度投资以及寻租行为便是典型例子^[8-9]。还有部分学者提出产业政策是否有效、何时有效受制于内外部诸多因素,如市场环境、融资约束程度、公司治理等^[5,10]。那么,产业政策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究竟如何?企业的各种经营决策与经营绩效最终会综合体现企业竞争能力的高低。在当前环境动荡、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政府干预措施是否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其影响机制如何,这些均是亟须解答的问题。

梳理现有企业竞争力的相关文献,不难发现,学者们已经从企业战略^[11]、创新能力^[12-13]、管理层特征及激励^[14]、内部治理^[15]等视角探讨了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而关于政府干预如何影响企业竞争力的研究较为不足。其中,较有突破的是:金碚和龚健健^[16]提出,偏紧性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会促使企业实施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投资规划;刘悦和周默涵^[17]在异质性企业垄断竞争模型框架内分析发现,在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下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存在差异;毕茜等^[18]认为开征环境税对企业竞争力有正向影响。但这些研究均未对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竞争力的效果及其具体机制做深入探讨。

回顾关于产业政策与企业竞争力的已有研究发现,学者们虽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仍然存在明显不足:首先,现有关于产业政策与微观企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政策与企业行为、企业绩效的关系方面,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竞争力的相关研究较少;其次,即使是政府干预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研究,也缺乏不同条件下影响的差异分析和影响机制分析;最后,现有关于企业竞争力的文献多是基于全样本或分行业的研究,而对于特定区域内企业竞争力的研究较少。不同区域之间资源禀赋、市场环境、政治条件等差异显著,企业竞争力的表现存在客观差异,尤其是我国特定时期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时,研究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基于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及其不足,本文认为有必要进一步从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视角检验产业政策的微观经济效果,并深入分析产业政策与企业竞争力关系的内在影响机制,以期通过内部机制的完善与协调,最大限度发挥产业政策功效。相对于以往研究,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产业政策角度看,已有研究对产业政策与企业行为及绩效的关系展开了丰富探讨,但从企业竞争力视角研究产业政策微观经济效果的较少,本文从企业竞争力视角拓展了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相关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企业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异质性差异以及具体机制,丰富了产业政策与企业竞争力之间关系的文献。第二,从企业竞争力角度看,以往研究更多关注微观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关于政府干预如何影响区域企业竞争力的探讨较少。企业的经营发展内生于国家宏观制度环境,企业竞争力提升亦是如此。本文从政府干预入手,研究地方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竞争力的效果及具体机制,丰富了企业竞争力的相关研究。第三,从地区发展角度看,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支持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学术界关于如何实现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进而提高其区域竞争力的相关探讨愈发热烈。本文从政府宏观调控以及企业竞争力双重视角,探讨产业政策如何助力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提升,对于长三角地区更好、更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余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本文的数据来源、变量定义以及模型设计;第四部分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作基准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从省份差异以及企业自身特征入手,对产业政策影响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作异质性检验;第六部分是产业政策实施的具体机制分析;最后是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制度背景和研究假设

(一) 制度背景

产业政策,通常是指政府为了扶持特定行业而采取的选择性政策^[9]。产业政策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广泛应用,其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建设成为中国发展的重心,此时,政府主导市场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同样引发中国的关注。以选择性产业政策主导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模式得到中国各方的认同。1989年3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这是中国第一部以产业政策命名的政策文件,该文件制定了当时产业发展的序列目录,明确提出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此文件为依据调整产业结构,并安排年度计划和“八五计划”^[5]。自此,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的产业政策也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管理与选择性产业政策混合的产业政策体系向以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功能性产业政策为辅的产业政策体系转变的过程^[19]。

从1989年《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开始,到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颁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征求意见稿)》,中国的产业政策贯穿了“八五”到“十三五”6个五年规划实施期间。一方面,本文对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五年规划作了对比分析,分析发现,中央产业政策与地方产业政策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差异性,地方政府会结合本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发展特点,对中央产业政策作出调整,确定地区重点发展产业清单及发展内容,据此指导本地区企业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分析各五年规划的主要内容与同时期政府出台的专项产业发展规划或政策发现,“五年规划”是政府对特定时期各产业发展做出的较为明确的指导方针,在政策方针的指导下,政府会根据各个产业的特点进一步制定专项产业发展规划或政策,对具体产业的发展目标、重点内容等做出详细部署安排。由于我国的分权化改革,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愈加突出,因此,相较于国家层面,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影响更加直接和深刻,同时又由于“五年规划”是其他专项发展规划的指导方针,因此,本文将选取地方政府连续出台的“五年规划”作为产业政策的代理变量,来研究产业政策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将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作为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经济中心,主要涵盖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三省一市。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关键是政策制度性因素如何协调有效地为该战略的实施而服务。研究地方产业政策如何影响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是个重要切入点,可以为完善产业政策,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二) 研究假设

根据市场失灵理论,在现实市场经济中,由于垄断、信息不完全、外部性、公共品等因素的存在,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很难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来对经济进行干预和引导。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通过不同政策工具的组合搭配对产业发展及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进而作用于产业的微观企业个体。具体而言,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四种机制影响企业竞争力:

第一,资源配置机制。为了配合产业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会对产业政策支持行业提供一系列优惠措施,如更廉价的信贷资金、政府对特定行业的补助以及税收优惠等,从而改变要素资源在不同行业间的配置,引导资源向受鼓励行业倾斜,促进相关行业快速发展,使行业竞争力乃至企业竞争力均得到提高。首先,根据信贷配给理论,由于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没有动力通过提高利率来满足所有的贷款需求,而是以信贷配给的方式满足部分贷款需求。我国政府一直主导着银行业的改革过程,毫无疑问,政府干预必然会影响银行业的贷款偏向,政府会倾向于通过降低信贷标准使受鼓励的企业获得更多贷款和更低利率的贷款^[20]。其次,补助作为政府扶持的最直接手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政府财政资源的配置方向。由于政府会根据企业的投资机会分

配补助,因此政府补助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资金需求,从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改善投资不足^[21]。Cerqua and Pellegrini^[22]发现财政补贴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水平和公司成长性,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最后,税收优惠可以补偿企业创新的外部成本,激发企业创新活力,通过引导企业内部资源的流动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经济附加值,进而提高企业产品竞争力^[23]。

第二,创新激励机制。迈克·波特曾指出,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企业创新。然而企业创新不仅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而且具有研发周期长、风险高、外部性等特征,这些特征会使企业面临“创新死亡之谷”的考验,从而降低企业创新投资意愿,导致创新投资不足^[24]。然而,产业政策却可以通过政府意志,弥补创新不足和市场失灵^[7,25]。产业政策工具中的创新补贴、税收优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研发成本,缓解企业研发投入中面临的资金压力,分散企业创新风险。政府采购和技术管制不仅刺激企业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投入,还为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制提供了市场需求导向。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以及专利制度为企业研发创新提供了激励保护机制,使企业在利益驱动下衍生出进一步加大研发创新的动力,企业的创新意愿和创新能力均得到提高,因而提升了企业核心竞争力^[26]。

第三,竞争机制。地方政府主要通过直接干预的手段改变行业内企业间的竞争状态来干预产业发展。如,地方政府可通过适当放宽受支持行业的市场准入及项目审批限制,降低行业进入门槛,使行业潜在进入者更容易跨过进入壁垒成为行业内的竞争者,从而增强产业政策支持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相对于垄断行业,竞争行业内的企业面临更强烈的竞争,企业为了保持其市场份额,必须不断创新以增强竞争能力。同时,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管理层进行监督,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竞争力^[6]。

第四,信号传递机制。根据波特的钻石模型,产业政策的信号传递效应主要是通过消除和减少关键要素内部及要素之间的信息不确定性而提升整个产业的竞争力的。在市场层面,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产业政策的扶持会向市场传递产业的发展潜力,尤其是产业政策的信息指导措施会指明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降低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水平,促使社会提高对产业政策鼓励企业的预期,从而产生较高的信用水平,金融机构的放贷意愿提高,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意愿和能力也会增强。在政府层面,实际部门与学术界关于产业政策实施后的政策评估会发现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对企业创新、投资、融资、绩效等的作用效果,并且发现产业政策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噪音(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间的摩擦)的由来^[23],由此政府通过对政策的不断调整和优化,为受鼓励产业提供更加完善的政策体系,进而助力产业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基于产业政策的资源配置机制、创新激励机制、竞争机制以及信号传递机制的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 产业政策对企业竞争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

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中在沪深A股上市的公司作为样本,在样本筛选过程中,剔除了以下样本:金融类上市公司;ST类上市公司;数据不全的公司。最终,得到5217个观测值。此外,为了避免奇异值的影响,对数据做了1%的Winsor处理。本文公司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产业政策数据通过手工整理各省市的“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规划”文件得到^①。

2. 变量定义

(1) 企业竞争力。针对企业竞争力的评价,国内外学者构建了不同的测评指标与评价体系。其中,由金碚^[27]主持的中国产业和企业竞争力检测项目对学术界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基于指标的可获得性、显见性及综合性等方面的考虑,从其评价指标体系中选择前8个显性指标对企

业竞争力进行度量。在参考金碚^[27]“中国经营报企业竞争力检测体系”对各指标设置权重时,由于出口收入占销售收入比率对竞争力指标的影响较小(权重仅为5%),且数据较难获取,因此本文在度量竞争力时将其剔除。最终,将标准化后的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观测样本的企业竞争力得分。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

(2) 产业政策。参考杨继东和罗路宝^[9]、刘婷婷等^[6]文献,根据各省五年规划中相关行业发展规划,确定企业是否属于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若受产业政策支持,则产业政策(*IP*)取值为1,否则为0。

(3) 控制变量。本文参考已有关于企业竞争力的研究文献,选取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产权属性(*State*)等反映企业基本信息的指标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Firsh*)、两权分离率(*SepRate*)、两职合一(*Power*)、监事会规模(*Board*)等反映企业内部治理能力的指标为控制变量;此外,还设置年度(*Year*)和行业(*Industry*)虚拟变量。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2。

(二) 模型设计

为检验产业政策对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效果,设置模型(1):

$$EC_{it} = \beta_0 + \beta_1 IP_{it} + \beta_i Control_{it} + \mu_i + \gamm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企业竞争力 EC_{it} 为被解释变量,其值根据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得到;地方产业政策 IP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解读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的五年规划文件得到;在控制变量 $Control$ 中,包含了反映企业基本特征和企业内部治理能力的两组变量以及年度(*Year*)、行业(*Industry*)虚拟变量; μ_i 为个体效应, γ_i 为时间效应; ε_{it} 为模型的随机误差项。为了克服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扰动,回归分析中均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校正。本模型将重点关注系数 β_1 ,若 β_1 显著为正,则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竞争力提升有促进作用。

四、产业政策对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表3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分析结果。为观察结果的稳定性,我们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方式进行检验。第(1)列报告的是仅控制年份和行业虚拟变量,不加任何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产业政策(*IP*)的系数为0.003,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在第(2)列中加入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产权属性(*State*)等表征企业基本特征的控制变量后,*IP*的系数及显著性水平均未改变。在第(3)列中继续加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h*)、两权分离率(*SepRate*)、两职合一(*Power*)、监事会规模(*Board*)等反映企业内部治理能力的变量后,*IP*的系数为0.004,比第(1)列和第(2)列中的系数均有所提高,同时显著性水平不变(但*T*值增大)。表3第(1)列至第(3)列的分析结果表明,产业

表1 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因素	指标	权重	数据来源
规模子因素	营业收入	19	从数据库中直接获取
	净资产	10	
	净利润	15	
增长子因素	近三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16	(当年营业收入/3年前营业收入) ^{1/3} -1
	近三年净利润增长率	13	
效率子因素	净资产利润率	8	净利润/净资产
	总资产贡献率	8	净利润/总资产
	全员劳动效率	6	营业收入/企业员工总数

表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定义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企业竞争力	<i>EC</i>	根据指标体系计算得分	5 217	0.230	0.040
产业政策	<i>IP</i>	解读各省五年规划文件得到	5 217	0.504	0.500
企业年龄	<i>Age</i>	企业自成立至今的年数	5 217	18.098	5.323
企业规模	<i>Size</i>	ln(期末总资产)	5 217	22.207	1.060
产权属性	<i>State</i>	国有企业赋值2,否则1	5 217	1.396	0.692
第一大股东持股	<i>Firsh</i>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5 217	34.682	14.437
两权分离率	<i>SepRate</i>	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与所有权之差	5 217	5.381	7.983
两职合一	<i>Power</i>	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时取1,否则0	5 217	0.257	0.437
监事会规模	<i>Board</i>	监事会人数	5 217	3.505	0.982

政策确实是影响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宏观政策因素,产业政策会促进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提升,假设1得以验证。

本文也分时间段考察了产业政策对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的影响,表3第(4)列是“十二五”期间的回归结果,第(5)列是“十三五”期间的回归结果,两个时期中产业政策(*IP*)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上述结果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均是成立的。但不可否认,产业政策与企业竞争力之间还可能存在着内生性问题,即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可能本身就具有较高的竞争力,产业政策的影响存在被高估的可能性。为了消除产业自身特征的影响,本文将利用长三角各省市地方“十三五”规划对鼓励行业的调整,设置实验组和控制组,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稳健性检验。

借鉴余明桂等^[28]和杨蓉等^[4]的做法,DID模型设置如下:

$$EC_{it} = \beta_0 + \beta_1 Treat_{it} \times Inyear_{it} + \beta_2 Treat_{it} + \beta_3 Inyear_{it} + \beta_4 Control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EC_{it} 为被解释变量,代表企业竞争力。 $Treat_{it}$ 和 $Inyear_{it}$ 为两个虚拟变量, $Treat_{it} = 1$ 为实验组,表示“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中都受产业政策鼓励的行业; $Treat_{it} = 0$ 为控制组,表示“十二五”规划中受产业政策鼓励、“十三五”规划中未受鼓励的行业。事件冲击时间为“十三五”规划开始实施的年度即2016年,其中 $Inyear_{it} = 1$ 表示2016年之后(“十三五”期间), $Inyear_{it} = 0$ 表示2016年之前(“十二五”期间)。 $Control_{it}$ 为控制变量, ε_{it} 为随机干扰项。其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β_1 ,若 β_1 显著为正,则表明产业政策对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提升有明显促进作用。

表4报告了DID模型的回归结果,第(1)列是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列是加入控制变量后的结果。由表4可知, $Treat \times Inyear$ 的系数均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在利用DID估计缓解产业政策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产业政策对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依然有促进作用,表明表3所展示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五、产业政策影响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的异质性检验

前文的实证结果显示,产业政策对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具有促进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中国仍以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在选择性产业政策中,政府处于主

表3 产业政策与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的回归结果

Variable	(1) <i>EC</i>	(2) <i>EC</i>	(3) <i>EC</i>	(4) <i>EC</i>	(5) <i>EC</i>
<i>IP</i>	0.003*** (2.7)	0.003** (2.46)	0.004*** (3.18)	0.003* (1.83)	0.005*** (2.73)
<i>Age</i>		-0.000** (-2.18)	-0.000* (-1.92)	0 (-0.80)	-0.000* (-1.76)
<i>Size</i>		0.013*** (22.18)	0.012*** (18.26)	0.013*** (14.44)	0.012*** (12.68)
<i>State</i>		0.002** (2.23)	0.003** (2.09)	0.006*** (2.99)	0.002 (0.94)
<i>Firsh</i>			0.000*** (4.39)	0.000*** (4.15)	0.000*** (2.72)
<i>SepRate</i>			-0.000*** (-2.80)	-0.000*** (-2.75)	0 (-1.24)
<i>Power</i>			0.003*** (2.86)	0.003* (1.83)	0.003 (1.51)
<i>Board</i>			0.003*** (4.64)	0.003*** (3.11)	0.001 (1.41)
<i>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Yes
<i>_cons</i>	0.234*** (154.01)	-0.052*** (-3.97)	-0.056*** (-3.71)	-0.070*** (-3.56)	-0.022 (-1.05)
N	5 217	5 217	5 217	3 262	1 955
r2_w	0.496	0.529	0.582	0.648	0.612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4 产业政策影响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的DID估计结果

Variable	(1) <i>EC</i>	(2) <i>EC</i>
<i>Treat × Inyear</i>	0.002* (1.65)	0.003* (1.74)
<i>Control</i>		Yes
<i>Year</i>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i>_cons</i>	0.234*** (239.02)	0.040*** (4.21)
N	5 217	4 385
r2_w	0.591	0.655

注: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导地位,会干预甚至替代市场的选择^[19]。在这种背景下,不同类型企业受产业政策影响的程度可能存在差异。因此,如果本文关于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提升这一结果确实由产业政策扶持引起,那么,也应该观察到这一效应在不同维度会表现出异质性。基于此,为了更深入探究产业政策影响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的运行机理,本文分别从地区差异以及企业自身特征两个维度入手,根据省份、产权性质以及企业生命周期等分别进行分组回归,从而对产业政策影响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进行异质性检验。

(一) 基于省份差异视角的检验

基于省份分组的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根据产业政策(*IP*)的系数及显著性可知,整体而言,长三角各省市中地方产业政策对本地区企业竞争力提升均起到了促进作用。进一步对系数进行对比分析可知,长三角各省市产业政策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上海市的产业政策效果最优,其次是安徽省,再次是江苏省和浙江省($0.011 > 0.01 > 0.004 > 0.003$)。该发现启示我们: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上海必须发挥“龙头”作用,就如何提高政府调控的精度及有效性,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作更广泛的经验宣传;进一步地,如何提高长三角地区产业政策的整体经济效果?刘志彪^[1]指出,制度因素是阻碍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因素。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必须不断破除地区之间的行政壁垒,协调好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应逐步将该地区产业政策的制定上升到区域层面或中央政府层面,从而确保产业政策对市场调节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二) 基于产权性质视角的检验

除了地区差异外,企业自身特征如企业的产权性质可能会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基于产权性质分组的检验结果如表6中Panel A所示。第(1)列中产业政策(*IP*)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产业政策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竞争力提升;第(2)列中产业政策(*IP*)系数虽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产业政策对非国有企业竞争力提升效果不明显。究其原因,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优势,因此能够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同时,由于政府主导国家金融体系的改革进程,政府干预必然会影响银行业的贷款偏向,政府会倾向于通过降低信贷标准使受鼓励的企业获得更多贷款,而政府是国有企业的实际控制人,银行等金融机构会更倾向于向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因此,国有企业获得金融支持力度会更大。杨蓉等^[4]也指出非国有企业仍面临严重的金融歧视。

值得强调的是,也有部分学者指出,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内部更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会降低政府干预的经济效果;同时,国有企业也会承担辖区内更多的就业、税收、社会稳定等公共治理责任,从而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竞争力产生负向影响^[29-30]。

由此可以看出,产业政策效果在产权性质视角的差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的研究不仅更深入地揭示了产业政策的运作机理,而且研究结果还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提高民营企业活力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

表5 产业政策影响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的
分组回归结果:基于省份差异

Variable	企业竞争力(<i>EC</i>)			
	上海 (1)	安徽 (2)	江苏 (3)	浙江 (4)
<i>IP</i>	0.011*** (2.99)	0.01*** (2.86)	0.004* (1.79)	0.003* (1.87)
<i>Age</i>	-0.001** (-1.98)	-0.001 (-1.25)	-0.002 (-1.30)	-0.000** (-2.09)
<i>Size</i>	0.015*** (8.6)	0.015*** (7.06)	0.015*** (8.52)	0.009*** (10.32)
<i>State</i>	-0.003 (-1.06)	0.008* (1.73)	0.009** (2.08)	0.004* (1.76)
<i>Firsh</i>	0.000 (1.42)	0.000** (2.3)	0.000 (1.1)	0.000*** (2.88)
<i>SepRate</i>	0 (-0.44)	0 (-0.03)	0 (-1.43)	-0.000* (-1.65)
<i>Power</i>	0.011*** (3.85)	0.002 (0.43)	0 (-0.17)	0.002 (1.44)
<i>Board</i>	0.011*** (7.62)	0 (0.22)	0.003 (1.44)	-0.001 (-0.76)
<i>Year</i>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i>_cons</i>	-0.110*** (-2.88)	-0.106** (-2.28)	-0.099** (-2.46)	0.03 (1.47)
<i>N</i>	1 346	801	1 531	1 539
<i>r2_w</i>	0.575	0.606	0.598	0.621

注:括号内为*t*值;***、**、* 分别表示1%、5%、10%的显著性水平。

(三)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检验
前文所研究的产权性质属于企业自身特征的静态层面,企业成长过程的动态变化是否也会影响产业政策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其经营状况、现金流量以及投融资能力等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产业政策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借鉴 Dickinson^[31]、吴倩等^[32]的文献,根据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和筹资活动现金流量的符号来划分生命周期阶段并对其进行检验。具体划分见表7。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分组回归结果见表6中Panel B。第(3)列和第(4)列显示,在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产业政策(IP)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受产业政策支持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竞争力明显提高;第(5)列显示,在衰退期,产业政策(IP)的系数虽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即使受产业政策支持,衰退期企业的竞争力也并未显著提高。该研究结论表明,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进行资源配置时,要根据企业生命周期进行动态调整,使资源更多流向成长期及成熟期企业,及时整顿衰退期企业,使其顺应规律退出市场。

六、产业政策实施的具体机制分析

前文研究表明,产业政策有利于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提升,且这种效果表现

出地区差异和企业自身特征差异。那么,产业政策通过何种机制作用于企业竞争力?前文提出的资源配置机制、创新激励机制、竞争机制以及信号传递机制是否真实发挥了作用?鉴于指标的可衡量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部分将重点对产业政策的前三种作用机制进行实证检验。模型设置如下:

$$EC_{it} = \beta_0 + \beta_1 IP_{it} + \beta_2 Mech_{it} + \beta_3 IP_{it} \times Mech_{it} + \beta_4 Control_{it} + \mu_i + \gamma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模型(3)中, $Mech_{it}$ 表示产业政策实施的具体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用银行信贷(Bloan)、政府补贴(Subs)、税收优惠(Tax)三个指标衡量,其中,银行信贷 = 非流动负债/总资产,政府补贴 = 政府补助/固定资产净值,税收优惠 = 所得税税率 - 所得税费用/息税前利润总额;创新激励机制(Inno)用“研发支出/总资产”来衡量;市场竞争机制(HHI)用 $HHI = \sum (X_i/X)^2$ 来衡量, $X = \sum X_i$, X_i 为行业内企业 i 的销售额。模型中将重点关注系数 β_3 , 除市场竞争机制外, β_3 若显著为正,表明产业政策支持下,该机制有利于企业竞争力提升;对于市场竞争机制, β_3 若显著为负,则表明产业政策支持下,市场竞争机制有利于企业竞争力提升。

表6 产业政策影响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的分组回归结果:基于企业自身特征

Variable	企业竞争力(EC)				
	Panel A: 基于产权性质		Panel B: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		
	国企 (1)	非国企 (2)	成长期 (3)	成熟期 (4)	衰退期 (5)
IP	0.005*** (4.03)	0.001 (1.33)	0.003** (2.00)	0.004** (2.47)	0.003 (0.92)
Age	0.000 (-0.73)	0.000 (-0.10)	0.000 (-1.61)	-0.000* (-1.73)	0.000 (0.29)
Size	0.017*** (12.38)	0.011*** (14.54)	0.012*** (13.84)	0.012*** (12.47)	0.014*** (8.68)
State			0.005*** (2.73)	0.003 (1.34)	0.007** (2.01)
Firsh	0.000 (0.32)	0.000*** (4.57)	0.000** (1.97)	0.000*** (3.52)	0.000*** (3.49)
SepRate	0 (-0.22)	-0.000*** (-3.34)	-0.000*** (-2.67)	-0.000* (-1.66)	0.000 (-1.42)
Power	0.007*** (3.04)	0.002* (1.81)	0.003** (2.07)	0.002 (1.26)	0.002 (0.60)
Board	0.008*** (7.19)	0.002** (2.52)	0.003*** (3.45)	0.001 (0.82)	0.002 (0.99)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0.168*** (-5.54)	-0.021 (-1.29)	-0.035* (-1.89)	-0.045** (-2.09)	-0.103*** (-2.90)
N	2 066	3 151	2 206	2 002	1 009
r2_w	0.61	0.579	0.556	0.69	0.428

注: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表7 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划分

阶段	成长期		成熟期			衰退期	
	初创	成长	成熟	动荡	动荡	动荡	衰退
经营现金净流量	-	+	+	-	+	+	-
投资现金净流量	-	-	-	-	+	+	+
筹资现金净流量	+	+	-	-	+	-	-

(一) 资源配置机制分析

1. 银行信贷

表8中 Panel A 汇报了银行信贷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回归结果。第(1)列显示,在未考虑产业政策情形下,银行信贷(*Bloan*)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银行信贷对企业竞争力会产生负向影响。该结论显示,由于我国融资以银行信贷为主,信贷在社会融资总量中占比最大,企业高财务杠杆的现象普遍存在。高杠杆会使企业面临严峻的资金流压力,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并会加剧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从而不利于企业竞争力提升。这表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坚决遏制企业债务明显偏高的状况,坚持去杠杆不动摇。第(2)列显示,在使用产业政策调控时,产业政策与银行信贷交叉项($IP \times Bloan$)的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银行信贷虽然是政府干预微观企业发展的重要工具,但效果不容乐观,即产业政策支持下企业银行信贷的增加并未提高企业竞争力。

2. 政府补贴

表8中 Panel B 汇报了政府补贴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回归结果。第(3)列显示,在未考虑产业政策情形下,政府补贴(*Subs*)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竞争力产生正向影响。第(4)列显示,考虑产业政策调控时,产业政策与政府补贴交叉项($IP \times Subs$)

表8 资源配置机制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回归结果

Variable	EC					
	Panel A: 银行信贷		Panel B: 政府补贴		Panel C: 税收优惠	
	(1)	(2)	(3)	(4)	(5)	(6)
<i>IP</i>		0.003 ** (2.05)		0.003 ** (2.2)		0.005 *** (3.03)
<i>Bloan</i>	-0.057 *** (-7.57)	-0.065 *** (-7.17)				
$IP \times Bloan$		0.015 (1.54)				
<i>Subs</i>			0.003 *** (3.44)	0.001 (0.87)		
$IP \times Subs$				0.003 * (1.76)		
<i>Tax</i>					0.066 *** (13.65)	0.060 *** (10.73)
$IP \times Tax$						0.013 ** (2.18)
<i>Age</i>	0.000 (-0.96)	0.000 (-0.92)	-0.000 ** (-2.34)	-0.000 ** (-2.32)	-0.000 *** (-2.63)	-0.000 *** (-2.57)
<i>Size</i>	0.015 *** (18.82)	0.015 *** (18.77)	0.013 *** (18.58)	0.013 *** (18.57)	0.012 *** (17.45)	0.012 *** (17.38)
<i>State</i>	0.004 ** (2.34)	0.004 ** (2.36)	0.003 ** (2.09)	0.003 ** (2.17)	0.003 ** (2.12)	0.003 ** (2.2)
<i>Firsh</i>	0.000 *** (4.17)	0.000 *** (4.13)	0.000 *** (4.2)	0.000 *** (4.21)	0.000 *** (3.6)	0.000 *** (3.61)
<i>SepRate</i>	-0.000 *** (-2.98)	-0.000 *** (-2.96)	-0.000 ** (-2.40)	-0.000 ** (-2.40)	-0.000 *** (-2.85)	-0.000 *** (-2.81)
<i>Power</i>	0.003 ** (2.55)	0.003 ** (2.53)	0.003 *** (2.86)	0.003 *** (2.83)	0.003 *** (2.72)	0.003 *** (2.73)
<i>Board</i>	0.004 *** (4.95)	0.004 *** (4.94)	0.003 *** (4.87)	0.004 *** (4.89)	0.003 *** (4.94)	0.003 *** (4.97)
<i>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Industry</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cons</i>	-0.117 *** (-6.54)	-0.116 *** (-6.51)	-0.062 *** (-4.06)	-0.063 *** (-4.07)	-0.047 *** (-3.13)	-0.046 *** (-3.09)
<i>N</i>	5 217	5 217	4 262	4 262	5 217	5 217
<i>r2_w</i>	0.612	0.612	0.595	0.595	0.601	0.601

注: 括号内为 *t* 值; ***, **, *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的系数亦显著为正,表明产业政策支持下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有利于其竞争力的提升。关于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学术界争论由来已久。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增加创新投入^[33],有利于改善中小型创新企业的经营状况^[34],有利于提高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35];但也有学者认为,政府补贴会干预企业的市场进入和退出,导致企业之间的资源配置扭曲^[36],还可能对企业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37]。本文则从企业竞争力视角,肯定了政府补贴的积极效果。政府补贴作为企业利润的组成部分,能够为企业带来充足的现金流,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尤其是针对创新活动的专项补贴,能够分散企业创新风险,极大地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活动;更进一步地,企业研发创新有利于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企业竞争力。本部分研究说明,在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应充分发挥其财政功能,通过科学、合理运用政府补贴机制,提升企业竞争力。

3. 税收优惠

表8中Panel C汇报了税收优惠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回归结果。第(5)列显示,在未考虑产业政策情形下,税收优惠(Tax)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税收优惠对企业竞争力产生正向影响。第(6)列显示,考虑产业政策调控时,产业政策与税收优惠交叉项($IP \times Tax$)的系数亦显著为正,表明产业政策支持下企业获得税收优惠力度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其竞争力。产业政策支持下,政府给予企业的各种优惠性税收待遇,能够降低企业纳税负担,相当于对特定企业及其经营活动实施间接补贴,从而利于缓解企业融资压力、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及投资,体现出税收优惠的正向激励效应。

(二) 创新激励机制分析

表9中Panel A汇报了创新激励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回归结果。第(1)列显示,在未考虑产业政策情形下,创新激励($Inno$)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创新投资的增加对企业竞争力会产生正向影响。第(2)列显示,考虑产业政策调控时,产业政策与创新激励交叉项($IP \times Inno$)的系数亦显著为正,表明产业政策支持下企业增加创新投资有利于提高其竞争力。产业政策支持下,政府不仅通过创新补贴以及税收方面的优惠为企业创新提供资金方面的支持,还会通过技术管制、生产安全管制等政府管制措施激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提高技术水平。企业创新能够通过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提高生产率,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因此,在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要不断提高对创新政策的重视程度,提高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三) 市场竞争机制分析

表9中Panel B汇报了市场竞争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回归结果。第(3)列显示,在未考虑产业政策情形下,市场竞争(HHI)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所在行业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竞争力越高。相对于垄断行业,竞争性行业的“倒逼”机制迫使企业必须增强创新能力才能保持并扩大市场份额,这有利于企业竞争力的不断提升。第(4)列显示,在考虑产业政策调控时,产业政策与市场竞争交叉项($IP \times HHI$)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产业政策支持下,市场竞争机制对企业竞争力提升未发挥明显作用。该研究结论说明,当前我国重点推行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并不利于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产业政策的扶持和管制措施会阻碍企业进入或退出某个行业的机会,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暴露了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不良政策效应。

表9 创新激励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影响企业竞争力的回归结果

Variable	EC			
	Panel A: 创新激励		Panel B: 市场竞争	
	(1)	(2)	(3)	(4)
IP		0.005** (2.26)		0.003*** (3.74)
$Inno$	0.361*** (6.84)	0.307*** (4.77)		
$IP \times Inno$		0.08** (2.48)		
HHI			-0.555*** (-9.54)	-0.586*** (-8.31)
$IP \times HHI$				-0.041 (-1.44)
Age	0.000 (-0.51)	0.000 (-0.50)	-0.000** (-2.07)	-0.000* (-1.88)
$Size$	0.015*** (17.6)	0.015*** (17.61)	0.007*** (15.61)	0.007*** (15.54)
$State$	0.004*** (2.59)	0.004*** (2.7)	0.004*** (4.6)	0.004*** (4.82)
$Firsh$	0.000*** (3.25)	0.000*** (3.31)	0.000*** (2.68)	0.000*** (2.81)
$SepRate$	-0.000*** (-3.15)	-0.000*** (-3.11)	-0.000* (-1.68)	0.000 (-1.59)
$Power$	0.003*** (2.78)	0.003*** (2.75)	0.002* (1.86)	0.002* (1.87)
$Board$	0.002** (2.52)	0.002** (2.55)	0.000 (0.12)	0.000 (0.19)
$Year$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_cons$	-0.105*** (-5.67)	-0.106*** (-5.70)	0.072*** -7.3	0.070*** -7.12
N	3 248	3 248	5 217	5 217
r^2_w	0.652	0.652	0.658	0.658

注: 括号内为 t 值; ***, **, *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

七、研究结论

本文以长三角地区 2011—2018 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了产业政策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产业政策对企业竞争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且该影响具有异质性。具体而言,从地区差异看,上海市地方产业政策效果最优,其次是安徽省,再次是江苏省和浙江省;从企业自身特征看,产业政策对长三角地区国有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竞争力提升有促进作用,对非国有企业和衰退期企业效果不明显。机制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支持下,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创新激励对长三角地区企业竞争力提升具有促进作用,银行信贷以及市场竞争对企业竞争力提升效果不明显。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未来长三角地区产业政策制定及企业竞争力提升具有借鉴意义。

首先,由于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中,上海市产业政策实施效果最佳,因此,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上海必须发挥“龙头”的带头作用,应就政府调控如何提高精度及有效性,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作更广泛的经验宣传;进一步地,为了实现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必须不断破除地区之间的行政壁垒,协调好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为此,应逐步将该地区产业政策的制定上升至区域层面或中央政府层面,从而确保产业政策对市场调节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11 月召开的民营经济座谈会上指出,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功不可没。民营经济对于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但本文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长三角地区非国有企业竞争力提升效果并不显著,这对于政府在制定并实施产业政策时,如何使政策更多惠及民营企业,从而提高民营企业活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再次,本文研究显示,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差异,因此,在对企业进行资源配置时,要注意动态调整,政府应使资源更多地流向成长期及成熟期企业,及时整顿衰退期企业,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最后,就产业政策实施的具体机制,政府应更广泛地发挥政府补贴、税收优惠以及创新激励的积极作用;调整信贷机制使用限度,遏制企业债务明显偏高状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继续坚持去杠杆;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逐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使产业政策的制定逐步从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过渡。

注释:

- ①政策文件分析显示,相对于各省市的“十二五规划”,上海“十三五规划”降低了对纺织服装、服饰业(C18)和批发零售业(F)的政策支持,加强了对通用设备制造业(C34)和专用设备制造业(C35)的支持;安徽“十三五规划”降低了对食品制造业(C14)、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8)、零售业(F52)、房地产业(K70)的政策支持,加强了对体育产业(R88)的支持;江苏“十三五规划”降低了对专用设备制造业(C35)、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8)的政策支持,加强了对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1)、汽车制造业(C36)、铁路运输业(G53)和航空运输业(G56)的支持;浙江“十三五规划”降低了对林业(A02)、畜牧业(A03)、渔业(A04)、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8)、房地产业(K70)的政策支持,加强了对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C15)、纺织业(C17)、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C19)、家具制造业(C21)、金融业(J)的政策支持。

参考文献:

- [1]刘志彪. 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制度基石[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9(4): 6-13.
- [2]黎文靖, 郑曼妮. 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6(4): 60-73.
- [3]CHEN D, LI O Z, XIN F. Five-year plans, China finance and their consequences [J].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17, 10(3): 189-226.

- [4]杨蓉,刘婷婷,高凯.产业政策扶持、企业融资与制造业企业创新投资[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8(11):41-51.
- [5]张莉,朱光顺,李世刚,等.市场环境、重点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差异[J].管理世界,2019(3):114-126.
- [6]刘婷婷,杨蓉,高凯.产业政策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9(5):46-56.
- [7]MUSACCHIO A,LAZZARINI S G,AGUILERA R V. New varieties of state capitalism: strategic and governance implica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15,29(1):115-131.
- [8]王克敏,刘静,李晓溪.产业政策、政府支持与公司投资效率研究[J].管理世界,2017(3):113-124+145+188.
- [9]杨继东,罗路宝.产业政策、地区竞争与资源空间配置扭曲[J].中国工业经济,2018(12):5-22.
- [10]张超林,王连军,袁立华.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J].产业经济研究,2019(5):39-50.
- [11]李创.企业环境战略及其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16(3):57-61.
- [12]BARNEY J B. Resource-based theories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a ten-year retrospective on the resource-based view[J].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1,27(6):643-650.
- [13]韩晨,高山行.二元市场学习、原始性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的关系研究[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8(1):1-11.
- [14]盛明泉,吴琪,张春强.管理层背景特征、薪酬激励与企业竞争力[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7(6):32-41.
- [15]姚文韵,郭艳红.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代理成本”的分析视角[J].产业经济研究,2012(6):60-67.
- [16]金碚,龚健健.经济走势、政策调控及其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基于中国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4(3):5-17.
- [17]刘悦,周默涵.环境规制是否会妨碍企业竞争力:基于异质性企业的理论分析[J].世界经济,2018(4):150-167.
- [18]毕茜,李萧言,于连超.环境税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基于面板分位数的研究[J].财经论丛,2018(7):37-47.
- [19]江飞涛,李晓萍.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产业政策演进与发展——兼论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转型[J].管理世界,2018(10):73-85.
- [20]张新民,张婷婷,陈德球.产业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投资效率[J].会计研究,2017(4):12-18+95.
- [21]李刚,侯青川,张瑾.政府补助与公司投资效率——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实证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7(4):74-82.
- [22]CERQUA A,PELLEGRINI G. Do subsidies to private capital boost firms' growth? A multipl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approach[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14,109(1):114-126.
- [23]白恩来,赵玉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机制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8(3):425-434.
- [24]BROWN J R,PETERSEN B C. Cash holdings and R&D smoothing[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10,17(3):694-709.
- [25]谭劲松,冯飞鹏,徐伟航.产业政策与企业研发投入[J].会计研究,2017(10):58-64+97.
- [26]曹平,王桂军.选择性产业政策、企业创新与创新生存时间——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证据[J].产业经济研究,2018(4):26-39.
- [27]金碚.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 [28]余明桂,范蕊,钟慧洁.中国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16(12):5-22.
- [29]陈艳利,赵红云,戴静静.政府干预、产权性质与企业脱困[J].经济学动态,2015(7):80-90.
- [30]钱雪松,康瑾,唐英伦,等.产业政策、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8):42-59.
- [31]DICKINSON V. Cash flow patterns as a proxy for firm life cycle[J]. The accounting review,2011,86(6):1969-1994.
- [32]吴倩,潘爱玲,刘昕.产业政策支持、企业生命周期与风险承担[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9(1):74-87.
- [33]ALECKE B,REINKOWSKI J,MITZE T,et al. Does firm size make a difference? Analy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D subsidies in east Germany[J]. German economic review,2012,13(2):174-195.
- [34]邓超,张恩道,樊步青,等.政府补贴、股权结构与中小创新型企业经营绩效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特征的实证

- 检验[J]. 中国软科学 2019(7):184-192.
- [35] 许家云, 徐莹莹. 政府补贴是否影响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基于出口国内附加值的视角[J]. 财经研究, 2019(9):17-29.
- [36] 金晓雨. 政府补贴、资源误置与制造业生产率[J]. 财贸经济 2018(6):43-57.
- [37] 李万福, 杜静, 张怀. 创新补助究竟有没有激励企业自主创新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新证据[J]. 金融研究 2017(10):130-145.

(责任编辑: 雨 珊)

How do industry policies affect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LIU Tingting¹, GAO Kai^{2,3}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Lixin University of Accounting and Finance, Shanghai 200120,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00, China; 3.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s and specific mechanisms of industry policies affecting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dustry policies play a role in enhancing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influence reflects heterogeneity. Specifi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vince differences, the effects of local industrial policies in Shanghai are the best, followed by Anhui Province, and then Jiangsu Province and Zhejiang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s, industry policies are conducive to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ut the effects are not obvio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nterprise life cycle,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at growth stage and maturity stage supported by industry policies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and the effects on enterprises in the recession period are not obvious. The paper further explores the resource allocation mechanism, innovation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market competition mechanism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ustry polic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government subsidies, tax incentives and innovation incentives under the support of industry policies can promote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But the effects of bank credit and market competition are not obvious.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y policies and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and clarifies the mechanism of effect on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by industry policies, which ha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formulating industry policies and improving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industrial policy;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heterogeneity; mechanism of action